

第三势力运动:《自由阵线》集团的兴衰

□ 陈正茂

1949年,国共内战尘埃落定,国民党政府仓皇迁台。风雨飘摇之际,一部分标榜反共、反蒋,坚持民主自由的政治人物与知识分子,在美国和桂系李宗仁的支持下,云集香江,首揭反国、共两党大旗,鼓吹第三势力主张,此即上世纪50年代于香港盛极一时的第三势力运动。当时第三势力之要角有张发奎、顾孟余、张君勱、左舜生、李璜、张国焘、许崇智、伍宪子、李微尘、童冠贤、谢澄平等,这些人分属民、青两党,部分为国民党及桂系政治人物。

当年他们在美国的金钱资助下,曾先后在港成立了“自由民主大同盟”、“中国民主反共同盟”、“中华自治同盟委员会”、“大中国建国会”、“中国民主大同盟”、“中国自由民主战斗同盟”等名称大同小异的第三势力团体。在这么多眼花缭乱、有如雨后春笋般成立的第三势力团体中,较具知名度的,当推青年党左舜生、谢澄平等创办的《自由阵线》集团。

搭上美国《自由阵线》集团枯木逢春

有关《自由阵线》集团的兴起,可以追溯到1949年李宗仁“代总统”期间。时国民党政府大势已去,李宗仁去国前夕,纷纷对有关的政治人物和政治团体大放交情极力拉拢,有的送钱,有的送官,有的送护照;自己则准备去美国争取美援后东山再起。青年党亦透过总统府秘书长邱昌渭分到两万美金(一说三万)。这笔钱即由谢澄平以团体名义领到,除部分拨给台湾青年党总部外,其余便在九龙牛池湾租屋,作为香港青年党人的落脚地,此即日后“自由出版社”的大本营所在。由于钱的数目不多,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,谢澄平即以这笔钱筹办了《自由阵线》周刊,首擎自由、民主、反共的火炬。

当时在香港的青年党人物,李璜、左舜生、何鲁之等,系属元老级的领导人物,但李、谢素来不睦,无从合作。因此初期的《自由阵线》,即成左、谢合作的局面。左任农林部长时,谢是他的政务次长,但此次拍档反而很快散伙,左、谢仅合作一段很短的时间即拆伙。问题是,谢在青年党内本为次级人物,未曾单独挑过大梁,同时声望也不够,因此李、左既然和他不能相处,谢自然想到另一元老何鲁之。在李、左不管的情况下,何最后同意与谢合作。

然而,谢合作后,《自由阵线》困窘的经济情况仍未改善,何甚至倾其私蓄,用来补贴亏损,但仍无起色。谢最后且向油麻地轮渡公司总经理刘德溥(亦为青年党员)借调资金,仍感不支。其间,《自由阵线》亦曾向台湾的国民党当局请求补助并获得应允,后因该刊言论转趋激烈,国民党因此停止补助,这可说是《自由阵线》最惨淡艰难的时期。然就在杂志社举债度日几近山穷水尽之时,谢澄平却忽然戏剧性地搭上美国路线,使得《自由阵线》有如枯木逢春,柳暗花明又一村了。

事情缘于某日,谢从外面回来,对何鲁之说,其在轮渡上巧遇民社党的一位友人卢广声,卢告知美国远东区最高政治幕后负责人尤金正在香港。此公频繁往来于东京、香港、马尼拉之间,积极物色自由民主人士,想在国、共之外,培养一个中间的力量。澄平听后速将此事就商于何鲁之,何氏赞成其积极采取行动。未几,澄平随即到花园道美国驻香港领事馆求见尤金。出来接见者为S君, S君告知尤金已去东京,有何事与其接洽是一样的。而此代号为S君者,不是别人,即为美国巡回大使杰塞普(Philip Jessup)。



↑↑“第三势力”骨干左舜生。
↑“第三势力”骨干李璜。
资料图片

因此从1950年1月起,谢澄平即频繁与杰塞普晤面。一谈之下,方知谢于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,杰塞普正在哥大任教。有此渊源,双方遂互有好感。而谢欲找的尤金,不过是杰塞普的副手,真正美国在东南亚政治最高的幕后负责人,正是杰塞普。由此谢澄平对杰塞普执弟子之礼甚恭而获杰氏好感,杰氏答应以亚洲基金会名义,给予每月两万美元的补助。

关于此事经纬,当年也参与第三势力运动的张葆恩,于谢澄平逝世后,在追悼文章中曾详实叙述其始末。张说:“谢与S君多次会谈后,虽然对彼此的企图心照不宣,但也不得其门,交换问题虽然广泛,但具体问题仍无着落。谢明知S君是干什么的,S君也知道谢的心意,但大家始终兜不拢。与此同时,S君也积极接触其他民主自由人士,如李微尘、孙宝毅、张国焘、黄宇人等。其时,蔡文治透过司徒雷登关系已在冲绳建立军事基地,所谓第三势力的军事重点已经建立了,而文化重点与政治重点尚未完成,S君着急,谢澄平更心急如焚,因为他的《自由阵线》已快撑不下去了。”

“不得已,谢澄平最后只有请何鲁之出马,在中环与S君晤面,在大家敞开心胸无所不聊的气氛中,逐渐建立互信。S君多次询问何鲁之对国共两党领袖之看法及美苏世界局势之意见,何均能坦诚以告,由是渐获S君赏识。就在第三次会谈后,S君决定金援青年党的《自由阵线》,支持青年党在文化思想上的反攻。最后敲定以《自由阵线》周刊和美方合作,先从文化方面做起,建立重点,由文

化运动,发展到政治运动,再进而及于军事的运动,形成第三势力的整体架构,以达成反共复国的使命。”《自由阵线》至此乃由谢澄平接手,并扩大规模办了“自由出版社”及《中声日报》《中声晚报》等刊物,形成所谓的《自由阵线》集团。

从“自由阵线”到“自由出版社”

当时谢澄平以《自由阵线》为言论喉舌,对倡导第三势力运动非常积极,常与张国焘、顾孟余、何鲁之、童冠贤举行五人茶话会,每星期四举行一次,开会地点多在童冠贤家里。其后又加入黄宇人、程思远、董时进、伍藻池、黄如今、罗梦册、史泽之等,举行跨党派九人定期座谈会,也在试图建立政治组织。后谢澄平认为可以将座谈会扩大为组织,并命名为“民主中国”,主张从教育着手,培育下一代,奠定组织的社会基础。

就在谢澄平准备筹组团体之际,又冒出一位H先生(可能是哈德门),乃美国中情局的华南首脑(S君则是华中的负责人)。此公支持张发奎,因张主持广州行营时与其有接触。H先生积极鼓动张发奎出山,但张发奎以自己是军人不懂政治为由,向H先生推荐顾孟余。顾为北大老教授,抗战时曾任中央大学校长,早年任过铁道部长,曾经与陈公博并称汪精卫的左右手,是“改组派”的大将,而张发奎过去在国民党内一向比较亲近汪精卫。顾、张二人战时均未随汪落水,保留一身清白,此刻香港重逢,一文一武,担负起第三势力的政治领导责任。于是第三势力终于形成顾、张联合领导的局面,且欲组新政团。

针对第三势力团体互立山头、各树旗帜的情况,谢澄平为此事曾询问S君,S君建议谢与他们合作。谢最后见了H先生,也引荐顾孟余见了S君,此为美国推动中国第三势力运动双头马车的局面。S君支持谢澄平,H先生力挺顾、张,为避免力量分散,澄平一派基于第三势力大联合的考虑,遂放弃自组政团,转而加入张、顾新政团的筹组工作,此即日后的“战盟”组织。“战盟”成立后,澄平与何鲁之等虽以青年党代表列名其中,但《自由阵线》集团仍维持独立运作,在整个第三势力运动中,依然拥有相当实力。

客观说来,《自由阵线》集团对第三势力运动的重要性与影响力较其后的“战盟”大得多,尤其在言论鼓吹方面更是如此。自澄平接掌《自由阵线》后,该刊即致力于第三势力理论的阐扬与宣传活动,1950年5月1日,该刊还特别出版“第三势力运动专号”,表明其作为第三势力旗手的决心。在《我们的基本信念》文中,《自由阵线》揭集“民主政治”、“公平经济”、“自由文化”三大纲领,作为打倒专制,反对独裁,建立独立民主的新中国的理想目标。

有了美援后的《自由阵线》周刊,后来正式改组为“自由出版社”,工作的业务范围迅速增加展开。在香港市面上,除定期的《自由阵线》周刊外,还发行“自由丛书”小册子、文艺小说、漫画集、专题研究、大学教本、名著翻译等。“自由出版社”的出书,在殖民地文化笼罩下的香港,点燃了自由民主的火炬。当时香港的第三势力刊物有丁文渊的《前途》,顾孟余、童冠贤为代表的《大道》,张君勱的《再生》,孙宝刚、孙宝毅兄弟的《民主与自由》等,但都不及“自由出版社”的声势浩大。

“自由出版社”的班底,基本上以青年党为主,因此内部人事大多由青年党人把持,其中重要人物有谢澄平、丁廷标、龚从民、史泽之、张葆恩、夏尔康、谭伯扬等。但为了推广业务,也对外积极延揽人才,如张国焘、李微尘、孙宝刚、黄如今等。尤其为增加生力军,更吸收

一批“民主中国青年大同盟”的青年知识分子加入。

此外,“自由出版社”亦出版大量反共书刊。据谢澄平说,“自由出版社”自1950年7月成立至1954年底止,《自由丛书》共出刊256种,举凡中国历史文化、各国政治文化、苏俄问题与军事专著等,约有60余种,而关于中共问题的书籍则有近百种之多。文化事业发展之速,单位之多,包罗之广,真是一日千里,令人侧目。

《自由阵线》集团的内讧和失败

《自由阵线》在上世纪50年代香港第三势力运动中,有其举足轻重的影响力,但最后仍不免走向衰败没落,此与领导人谢澄平的作风有绝对的关系。当年也是《自由阵线》集团核心干部的张葆恩,在谢辞世后,于台湾青年党刊物《全民半月刊》上所写的追悼文章中,即抖出不少惊人内幕。张说,谢澄平利令智昏,领导无方,不仅使对方(美国)失望;亦且没能把握时机,建立差堪自给的事业根基,以冀尔后能自己维持下去,不依赖外人,竟虚掷光阴十年,步入失败下场。而谢澄平领袖欲望极强,为争“战盟”秘书长而与李微尘不和,为此还得罪“盟主”张发奎。排挤青年党老干部,尤其是参与最初活动的人,怕其知道秘密而欲除之后快。想用新人又不放心,此为用人方面之矛盾。

此外,谢澄平树敌太多,也是《自由阵线》集团失败的另一原因。如谢原本与马义(司马璐)、齐星士(蒋炎武)等合办“自联社”,为《自由阵线》集团之外围组织,谢提供经费,交由马、齐共同负责。但未几,马、齐因互争领导权而合作破裂,又因经费问题与谢交恶,于是演出马登报诉求、齐则殴打于街头的丑剧。之所以如此,全是金钱在作祟,盖谢挟“秘密不可泄”为护身符,经济不肯公开,以满足其个人随支支配,恣意挥霍的欲望,终于导致人心离散。为钱,谢澄平甚至不惜得罪何鲁之,与其大吵一架,并逐渐减少经费,仅留一点供生活费,以求达到真正控制每人之胃的目的。

澄平不信任旧友,也未能结交新朋,在“战盟”无声无息时,谢澄平曾参加,也可说是发动两个组织,一为“独立民主运动”,一为“民主中国青年大同盟”。前者的成员有张国焘、黄宇人、李微尘、孙宝刚、黄如今等。后者的骨干是:胡越、许冠三(于平凡)、陈濯生、丘然、徐东滨等。“独立民主运动”的成员,都是饱经世故的志大才疏之士,各持己见,喋喋不休,一直谈不出个所以然来,最后散伙了事。“民主中国青年大同盟”倒是朝气蓬勃,有声有色。谢澄平最后发现那批青年也是想利用他的钱,才给他一个名,恍然大悟之余,赶紧缩手抽腿,双方亦弄得不欢而散。

不过这批青年人倒有实事求是的干劲,终于取得外援,创办《祖国》杂志,组成“友联出版社”。之后,更网罗人才,事业扩充到南洋新、马地区,早已步上自给的文化企业之路。而徐速等人的努力亦不落人后,先刊行《海潮》杂志,创办“高原出版社”,继而发行《当代文艺》月刊,专事文艺创作的出版,异军突起,销行海外,广及南洋,并以《星星·月亮·太阳》一书,名震文坛。

总之,由于谢澄平领导无方,所用非人,引致内讧,遭受外界鄙视,而在美国压力及要求下,更参与空投大陆地下工作人员之事。当年空投多达二三百人,都是有去无回,为安顿孤儿寡母,《自由阵线》集团曾耗去不少经费,导致后来捉襟见肘,伏下财务危机,终至瓦解的命运。

◎陈正茂(北台湾科学技术学院教授)